

“革命文学”论争与鲁迅的左翼身份建构

王 焯 李永奇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361005）

1930年3月2日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经过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之后，鲁迅和他的论敌们走到一起，被赋予了左翼作家身份，而且这一赋予也得到鲁迅的完全认同。这样，从外在赋予和内在认同上，鲁迅都成为真正意义的左翼作家。然而，身份的建构需要思想的基础与前提，而不是随便的命名与简单的接受。本文以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前后为分析对象，以图通过对这一历史阶段与过程的梳理，希望发现或找到鲁迅自我认同的思想根源。

（一）

我们知道，鲁迅与创造社论争之前，双方都有合作的意愿。1926年11月7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写到：“其实我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到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同时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在勉力写些文字。”^①1927年4月，鲁迅和创造社成员联名发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的宣言》；9月25日，他给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社，未名，沉钟三社。”^②同年12月，来到上海的鲁迅和创造社联合刊登《〈创造周报〉复活宣言》，准备在1928年元旦共同出版《创造周报》。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鲁迅在主动寻求一个联合战线，而目标就集中到创造社身上。令人困惑的是，鲁迅向来对创造社有些不满，而且与创造社无过多联系，那么，鲁迅为什么希望与它联合呢？

当然，这跟鲁迅决定走出彷徨、重新振作的精神变化有关。鲁迅经历新文化阵营解体、兄弟失和、女师大事件等挫折之后，决心重新寻找人生的道路，而此时创造社元老都在革命策源地广东，而且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但笔者看来，这些不能作为鲁迅主动联合创造社的首要原因。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鲁迅的“一点野心”是对“正人君子”的反击，是与创造社联合造就一个强大的战线；然而，前往革命的广州及表示与创造社联合，只是鲁迅表达自己意愿的话语，只是鲁迅希望新生的象征，却不能作为实际的转变与联合。其实，鲁迅的南下是在寻找实现“野心”的契机与力量，以抛弃北京社会留给他的孤独与绝望。那么，问题是鲁迅真把创造社作为自我转变的契机与力量吗？我们发现，鲁迅到广州后并未急于向创造社靠拢，而是关注广州的革命活动与“革命文学”，在他的演讲辞和文章中，革命、革命者、革命文学等语词大量出现。但是，广州的革命与革命者使鲁迅彻底失望与绝望。

广州的耳闻目睹加深了鲁迅的宿命意识，他愈加感到自己只能做一个文人而无法成为人们希望的战士或革命家。所以，他对广州的革命心存不满，把精力用在“革命文学”的关注上。在他看来，广州流行的“革命文学”并非真正意义的“革命文学”，只是在“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的文学，或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的文学。^③他认为，这样的文学表现的要么是恃强凌弱的压迫，要么是无聊之徒的笔墨游戏，根本没有表现出人间反抗压制与强权的自由精神和革命精神，只能异化或扭曲革命的本质与意义。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此时的“革命文学”有别于1928年论争时的“革命文学”。日本学者丸山升指出，“提倡为革命的文学，即使在四·一二政变之前，也不

^① 《鲁迅著作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83页。

^② 同上，第607页。

^③ 《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4页。

只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还包括国民党系统的文学，或者至少说是在‘为革命’、‘为宣传’的文学广泛的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①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鲁迅对“革命文学”的批评显然源于广州的感受，而且对于革命、革命者的本质思考也基于广州的经验。当鲁迅与创造社论争时，一个被研究者忽略的现象就浮现出来，即论证双方在经验感受与理论资源方面存在鸿沟，鲁迅批评的指向更多是广州的记忆，而创造社争论的知识背景却是无产阶级理论。当鲁迅认识到论争隐含的知识冲突后，他开始反思与修正自我，开始学习与接受论争对手的无产阶级学说。

广州的经历不仅带给他沉重的革命记忆与绝望，而且也轰毁了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他说，“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投书告密，或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②这种进化观念虽然被轰毁，但那时并未给鲁迅带来无产阶级唯物史观^③，或者说，鲁迅又落入绝望的深谷与思想的荒野上。思想的茫然与荒芜，增强了鲁迅寻求新思想、反抗绝望的精神动力，成为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间主动“投降”的原因，也成为鲁迅走向左翼的历史契机。鲁迅真诚地说过，“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④总之，创造社的无产阶级理论击中鲁迅思想中的荒芜，让绝望中的鲁迅发现了一丝走出绝望的光亮。

革命文学论争前的鲁迅，一方面处于思想危机的焦虑中，对革命与革命者、对社会与历史的绝望，让他实践“一点野心”的希望彻底化为泡影；另一方面反抗绝望与寻找新思想的意志也暗自滋长，革命文学论争的发生给鲁迅提供了内省与拯救的历史契机，他终于把新兴的无产阶级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视野中。与创造社联合的意愿与行为都不能真实说明他的绝望实质，也不能给绝望中的鲁迅带来思想转变的可能性。

(二)

1928年1月，新创刊的《文化批判》以崭新的姿态掀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冯乃超、李初梨等人带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回到中国，开始无产阶级文学的启蒙运动。他们的一个举措就是反对创造社与鲁迅联合，鲁迅与创造社合作的计划被搁置并成为后者的一个批评对象。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说，鲁迅“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中，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的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⑤这种批评不能肤浅地看成是文人的意气相争，或是后期创造社成员批评的盲目或错误^⑥，而应该认真把它视为是理论分歧的结果。

《文化批判》在出版预告中，明确提出其目的是“以学者的态度，一方面介绍最近各种纯正的思想；他方面更对于实际的诸问题为一种严格的批判的工作。”^⑦成仿吾在《祝词》中进一步说，“它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它将描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它将解答我们干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那里干起。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文艺及其余个个的分野皆将从《文化批判》明了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方略。《文化批判》将贡献

^①[日]丸山升：《鲁迅 革命 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②《鲁迅著作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映了在19世纪欧洲历史思想中不断增长的社会学倾向，它把社会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并断定那些与经济活动最直接相关的社会要素的逻辑优先性，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有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力量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揭示出来。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④《鲁迅著作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6页。

^⑥现代文学研究界和鲁迅研究者都认为，后期创造社成员对鲁迅的批评是盲目的与错误的，主要是受日本福本主义与路线的影响，而没有认真审视与探究这场论争所蕴涵的理论问题与思想分野。

^⑦吴宏聪等编《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9页。

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明朗的光大。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①总之,《文化批判》致力的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批判与无产阶级文学建设。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首先否定五四文学的个人主义观念,认为“文学,有它的社会根据——阶级的背景。文学有它的组织机能,——一个阶级的武器”,^②指出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是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③这种文学定义显然是一种新兴的文学理论,其背后隐喻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④,核心是以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否定文学的自律性,将文学视为无产阶级历史解放的斗争武器。王独清在一次演讲中鲜明地说,“我们的文学便是我们革命的一个战野,文学家与战士,笔与破击炮,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⑤

在新起的文化批判与文学理论面前,鲁迅被批评为“趣味主义”、“隐遁主义”、“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他也真实感到自己成为一个历史与思想的“落伍者”^⑥。虽然他以自己清末以来历次革命的经验与体验还击创造社的批评,期望将后者拉到令他绝望的中国黑暗中,但是,鲁迅的坚执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知甚少,还是被批评者视为“堂吉可德”的乱舞。鲁迅与创造社的理论分歧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革命文学”是否存在的问题。创造社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阶段已经发生变化,革命文学应该由混沌时期的文学转向无产阶级文学。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最后阶段(帝国主义),全人类社会的改革已经来到目前。在整个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二重压迫下的我们,也已经曳着跛脚开始了我们的国民革命,而我们的文学运动——全解放运动的一个分野——却还睁着双眼在青天白日里找寻以往的迷离的残梦。”^⑦鲁迅认为,“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⑧显然,鲁迅与创造社论争的分歧主要来自对革命现实的判断,广州经验使鲁迅认为革命“停滞”了,或者说,革命已堕落为武人的夺权与商人的获利。此外,崇尚“抱诚守真”的鲁迅还怀疑革命文学家的真诚性,他们多是小资产阶级而与工农毫无联系,他们怎能创造出革命文学来?其次是对“革命文学”性质的认识。针对创造社“一切文学都是宣传”的主张,鲁迅相对坚持文学的“文学性”,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⑨反对“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的宣传文学,告诫革命文学现在应力求内容的充实与技巧的上达。但是,鲁迅也承认文学的宣传功能,他说“我不相信文艺的扭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⑩“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⑪鲁迅对文学宣传性质的肯定隐含着两个思想倾向,一是他对反抗黑暗现实的力量支持与维护,显示着一直寻求前进的心曲;二是他对阶级文学合理内核的首肯,呈现鲁迅与创造社文学观念具有一些同质因素。

鲁迅如何对待创造社的批评呢?他在《三闲集·序言》中抱怨道:“但我到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

^①吴宏聪等编《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0页。

^②《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

^③同上,第163页。

^④20年代初30年代末,这种文学理论被称为“新兴文学论”、“唯物史观文艺论”或“科学的文艺论”而逐渐兴盛起来。这种文学理论的特征是“从作为表象的文艺出发达到对深层的社会关系、历史关系的政治性把握”。参见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49页。

^⑥鲁迅自我的落伍感与“门外汉”感,既表现在他无法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又表现在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无知,以至左联成立请他写作“宣言”时而自觉推却。

^⑦《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6页。

^⑧《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7页。

^⑨同上,第328页。

^⑩同上,第327、328页。

^⑪同上,第327、328页。

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①这种述说虽显示鲁迅的委屈与抱怨，但事实上鲁迅却逐渐接受了无产阶级文学观念，认识了文学的阶级性与作为“艺术的武器”的本质，尽管这种文学思想更新并不完全是创造社赐予的，还有鲁迅自觉阅读与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著作的结果。据统计，鲁迅仅在1928年中就购买了《从空想到社会主义》、《列宁给高尔基的信》、《马克思主义的作家论》、《艺术与唯物史观》等60多册此类书籍，而且翻译了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及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他和青年聊天时常使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等新名词，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承认“以史的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截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②这都表明，经过与创造社的革命文学论争，鲁迅意识到自己的“落伍”并加以以克服，主动向创造社批判所预设的理论天地进入，这虽不能说明鲁迅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看到了一条摆脱绝望的道路。相对于进化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给鲁迅带来了文学的新视野，其唯物、辩证的态度与鲁迅的思想方式相近而得到他由衷的首肯^③。鲁迅向来以为“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但论争留给他的却是对希望的坚信^④，却是对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执着。

不难看出，后期创造社的文化批判才真正给鲁迅带来了思想的实际变化，为“左联”的成立及鲁迅对左联的认同打下思想基础。当然，鲁迅并没有完全接受创造社文化批判的所有思想，而且有些分歧左联成立后仍然存在，但鲁迅还是整体上接受了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为此真诚表示要感谢创造社。换句话说，革命文学论争使鲁迅找到实现“一点野心”的历史契机与思想基础，使鲁迅找到摆脱绝望与“落伍”的新思想力量，从而与批判他的创造社走到一起结成左翼作家联盟。

(三)

“革命文学”论争的结果是左联的筹建，也是鲁迅左翼身份正式确认的过程。论争的结束与左联的成立，人们认为这是得到党的指导的结果。然而，仅以此解释左联成立的原因，可能会遮掩左联成立及左翼性质的复杂性。

我们知道，作为左联的前身，创造社、太阳社以及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五四”作家都是作为文学社团而存在的，这样，左联的成立与身份的建构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它究竟是政治性质的联盟还是文学性质的联盟？其实，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已经给出这样的信息，大革命失败后茅盾等一批职业革命家转入文学领域，富有叛逆精神的创造社“左”转，不少五四作家感到文学不能脱离政治而存在。这种文学状况既是政党革命对新文学影响日趋增强的表现，又是五卅以后新文学家思想日益左倾的结果，即是说，左联的筹建与左翼身份的建构还受到新文学家思想变化的驱使。不仅如此，左联成立的复杂性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就是创造社、太阳社已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1929年1月10日《创造月刊》被迫停刊，2月7日创造社被封，《文化批判》、《日出旬刊》、《文艺生活》等创造社刊物被禁。太阳社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太阳月刊》1928年出到七期被查禁，此后创办的《海风周报》、《新流月报》等也屡遭禁止。由于国民党文化审查制度^⑤的建立与实施，导致激进的革命文学社团难以存在，走向联合以对抗政府的文化制度也在情理之中，正如鲁迅致姚克的信中所说，“1930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

^①《鲁迅著作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14页。

^②同上，第375页。

^③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鲁迅现实的与历史的思想方式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参见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

^④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说，“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⑤国民党中央1928年间制定了《出版条例原则》，1929年1月国民党中宣部制定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几个月后，国民党又制订了《取缔反共书籍办法》，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出版法》。参见倪墨炎《现代文坛灾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

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①

在这些复杂的历史动因面前，左翼身份的性质建构就有些艰难与暧昧。1930年3月1日《萌芽月刊》刊登了《上海新文学者底讨论会》消息，称讨论会目的是清算过去“革命文学”论争的错误和成立新的文学团体，文中指出“作为讨论会的结果，还有更重要的一事，即全场认为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运动的必要。”^②这里，“左翼作家”作为名词第一次出现，但该文并未对它的内涵作出具体界定。对它进行界定的是“左联”的《理论纲领》，该纲领发表在1930年3月10日的《拓荒者》上，它指出左翼作家“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③这里，左翼身份被规定为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而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作家联盟。然而，从左联的组织机构、成员与左联的行动看，左翼表现出了文学与政治的双重性质，左翼既是激进文学家的文化身份又是文学家的革命象征。

鲁迅更多的是在文学意义上认同左联的左翼身份。我们知道，左联成立时鲁迅举荐了郁达夫加入，加入左联后鲁迅重视文学创作，培养了一批新生的青年作家，他自己很少参加左联组织的政治行动。鲁迅把左联看作“阵线”性质的文学团体而不是“第二党”，他参加它旨在实现造就文学战线的愿望。那么，鲁迅如何认识“左翼”身份的呢？在左联成立的大会上，他告诫左翼作家是很容易变为“右翼”作家的，他说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况而只对革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以救世主自居而期望获得工农的报偿，都很容易使左翼作家变为右翼作家。鲁迅的讲话表面上是对革命文学论争对手的激烈批评，实质上却反映着鲁迅对左翼身份的理解与认识。在鲁迅的心目中，左翼作家应该是革命的、现实的与高尚的^④，他不仅应成为政党革命意义的左翼作家，而且应成为超越政党政治的左翼作家。值得深思的，鲁迅对左翼身份的理解似乎又回到他原先的思想与经验中，留日时代拥有的个人无治主义思想，归国后一次次失败的革命留下的痛苦记忆，大革命策源地广州带来的革命绝望，这些都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爆发出来并使他产生“落伍”的意识。然而，鲁迅的这次批评与回归，却不能简单理解为鲁迅不满左联或与左联隔膜的表现，应理解成鲁迅对左联的由衷期望，期望左翼作家能够成为对抗强权、批评愚昧的文化战士。所以，鲁迅在讲话中提出要扩大左联的战线，“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而且要以“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⑤显然，鲁迅认同的左翼身份带着更多的自我性质，期望它可以实现自己心中从未实现的野心，在愚昧与专制的黑暗社会里建立一个理想的“人国”。

综上所述，“革命文学论争”成为鲁迅思想转变的真正历史契机，他意识到并克服了自己思想的“落伍”状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加入了左联，找到了可以实现自己“一点野心”的社会力量。然而，鲁迅对左翼身份的认同并非仅是政党革命意义的，还表现出文学甚至文化意义的，显示出自我意识与左联视野的思想差异与对话、融合。总之，鲁迅加入“左联”与左翼身份认同，有着自我精神与思想的历史发展为内在基础，这既使他成为富有现实斗争精神的左翼战士，又增加了左翼身份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①《鲁迅著作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21页。

^②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9页。

^③同上，第133页。

^④鲁迅最敬佩的革命者是孙中山，他的“革命尚未成功”遗训显示了一个革命者胸襟的伟大与高尚。鲁迅的讲话实质隐含着他对近代革命失败的痛苦经验，希望革命者能有正视历史与社会的现实态度、不断革命的超越精神、彻底实现个人自由与平等的伟大革命目标。

^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10、1012页。